

早期楚文化初析

尹弘兵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 江汉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的盘龙城遗址,以鼎式鬲为代表,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汉水东北地区出现柱足鬲遗存。西周中晚期时早期楚文化正式形成,出现早期楚式鬲和完整的早期楚文化陶器组合。此时早期楚文化遍及江汉地区,重心则在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与楚国无关,西周时期的楚国也只是早期楚文化中很小的一支。

关键词 早期楚文化 江汉地区 楚国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27(2011)03-0073-08

楚文化的起源问题曾长期困扰学术界,一直是楚文化研究的热点,也是楚文化研究的难点,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悬而未决。上世纪,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逐步深入,早期楚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在江汉地区发现了较多的早期楚文化遗存,特别是近年来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丹江库区发现了一些有关楚文化起源的新线索,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本文拟在学者已有探讨和目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对早期楚文化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江汉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

在考古学上,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形成于春秋中期前后,目前尚未见到早于春秋中期的楚式青铜器,但与楚式青铜器并存的一批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器,则可上溯至西周时期甚至更早。这些与典型楚文化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陶器遗存,目前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早期楚文化。这组陶器遗存以鬲为核心,以鬲、盂、豆、罐或鬲、盆、豆、罐为基本组合。鬲很有特点,器形上是北方的鬲与南方的鼎结合而成,似鼎非

鼎、似鬲非鬲,又被称为“鼎式鬲”或“鬲式鼎”,与商式的分裆鬲和周式的瘿裆鬲区别明显,一般为联裆或弧裆,空足很浅,甚至略有略无,高柱足,足跟与器身分开制作,俗称此制法为二次包制,学界称之为楚式鬲^[1]。陶系则多为红陶或红褐陶,少部分为灰陶,一般饰绳纹,俞伟超先生称之为“高腿锥足红陶绳纹鬲”^[2]。

就目前所知,联裆鬲起源于鄂东地区,在武汉盘龙城遗址的王家嘴下层,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存中,出土有目前最早的联裆鬲^[3],已初具楚式鬲的基本特征。由此可知,早期楚文化的时间范围,最早可以追溯至夏,其下限则在楚文化特征形成之前的春秋早期,而其主体部分,也最为学术界所关注的,则是在西周时期。

鄂东和鄂东北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是目前最早的。在鄂东的盘龙城遗址,发现有大量的平裆鬲和罐形鼎,据盘龙城报告,盘龙城遗址可分七期,其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或三期偏早,最晚的第七期则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盘龙城遗址的罐形鼎主要见于盘龙城一至三期,大致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平裆鬲和联裆鬲则在盘龙城七期遗存中都有发现^[4]。从器形上看,盘龙城的罐形鼎和平裆鬲、联裆

收稿日期 :2011-06-30

作者简介 :尹弘兵(1967-),男,湖北天门人,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

高明显是由鼎与鬲融合而来,一般为夹砂红陶或夹砂红胎黑陶、黑灰陶、锥足较高,有很浅的足窝,发掘报告将器底略下弧者称之为罐形鼎、器底略上凹或平底者称之为平裆鬲,后又出现联裆鬲。由这些特征可知,这类罐形鼎和平裆鬲、联裆鬲是由南方的鼎与北方的鬲融合而成,为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是鬲与鼎融合的最初形态,可称之为鼎式鬲。这种陶鬲亦见于鄂东南的阳新大路铺遗址,大路铺遗址商代遗存中的A型鬲亦是此类鼎式鬲,其特征亦是夹砂褐红陶、联裆、高锥足,饰绳纹,与盘龙城的平裆鬲和罐形鼎如出一辙^[5]。蕲春毛家嘴遗址,年代为西周初年,许多器物保留有殷末的风格^[6],另在毛家嘴遗址西600米处,发现有铜器窖藏^[7],该铜器窖藏应是从属于毛家嘴遗址的,年代为商末,其中的孟方鼎,作器者孟,为殷王文丁之子、帝乙的兄弟^[8]。学者认为毛家嘴遗址的性质为商亡后南逃于此的殷王族成员的遗存^[9]。毛家嘴遗址所出陶器,共同的特点是皆为柱足,按其形制,有分裆柱足鬲、联裆柱足鬲、平裆柱足鬲三种,其中平裆柱足鬲明显是从夏商时期的平裆高锥足鬲发展而来。此类融合南北文化的陶器遗存被创造出来后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到西周时期,更进一步与周文化结合起来。黄陂鲁台山所出西周早期遗物中,年代较早的式鬲明显具有周文化的瘠裆、锥足风格,较晚的式鬲则已变为柱状足,裆部虽仍为瘠裆,但开始向弧裆发展^[10]。在鄂东北的大悟吕王城遗址,西周早期陶鬲亦多具周文化风格,与沔西较为一致,但吕王城T2 :160,已初具楚式小口鬲作风,较晚的吕王城T2 :147、T2 B:118,虽仍为瘠裆,但已与楚式鬲风格较为一致^[11]。武汉新洲阳逻镇的香炉山遗址分为南北两区,其南区第2层和北区第11层属商代遗存,南区商代遗存年代为二里岗上层,北区大体为殷墟时期,但南、北两区商代遗存文化面貌迥异,南区商代遗存文化面貌与中原接近,北区则与香炉山早周遗存有相似性,以红陶为主,部分器物与早周同类器难以区分,西周时期,周文化进入,锥足瘠裆鬲

出现并演变为柱足鬲,最后在西周晚期出现楚式鬲^[12]。武汉放鹰台遗址西周遗存,年代大抵为西周早中期,文化面貌与大悟吕王城、黄陂鲁台山、新洲阳逻香炉山等属同一类型,而与香炉山遗址最为接近,所出鬲、甗、盆、孟、豆、罐,为早期楚文化基本组合,器型亦大体相类,鬲足采用包制方法,这是楚式鬲的基本特征之一,Ca式陶鬲,夹砂褐陶,圆唇、束颈、弧裆,柱足较高,与真武山、郭家岗等地所出陶鬲器型风格一致,C型侈口折壁豆盘亦与真武山较为一致,Aa型鬲(T3 :1)造型奇特,上部为直口、带盖、管状冲天流,下部为分裆稍平,柱足较高,与江汉地区周式鬲较为一致,应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13]。罗田庙山岗遗址西周遗存,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陶系以夹砂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器类有鬲、甗、罐、瓮、缸、孟、钵、豆等,纹饰以绳纹为主,与均县朱家台和大悟吕王城西周遗存关系密切,鬲分大口和小口两类,均为长方体、卷沿、侈口、弧裆、柱足较高,A型鬲有较明显的瘠裆风格,并有扉棱,B、C型鬲则为弧裆微瘠型,与襄宜地区出土的早期楚式鬲一致^[14]。汉川乌龟山亦出有少量西周晚期遗存,文化面貌与上述遗存基本一致^[15]。上述鄂东及鄂东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较为明显的来自北方的姬周文化与江汉土著文化融合的趋势。

丹江流域亦有较为广泛的早期楚文化分布,丹江上游地区,商南县过风楼遗址是目前极受关注的遗址,所出西周遗存年代约为西周中期,其陶器特征与关中周文化相去甚远,而与江汉楚文化有较为明显的亲缘关系,另东龙山、巩家湾、陈塬等遗址亦有类似遗存,年代大抵为西周中晚期^[16]。丹江下游地区,淅川下王岗遗址西周早期遗存大抵与沔西无异,但其中的式鬲,侈口、圆唇、鼓肩、收腹,联裆圆柱状足,与早期的楚式鬲颇有类似之处^[17]。均县朱家台遗址西周遗存出有较典型的楚式陶鬲和较完整的鬲、甗、盆、罐、豆组合^[18],文化面貌和年代与真武山、郭家岗等遗址所出西周晚期遗存基本一致。近期备受关注的郟县辽瓦店子

遗址,发现了有关楚文化起源的重要线索。

襄宜地区发现的早期楚文化遗存较多,汉水以南年代一般较晚,基本为西周中期以后的遗存。襄樊真武山遗址年代可早至西周中期^[19],宜城郭家岗遗址年代可早至西周晚期偏晚或两周之际^[20]。由于地处楚文化核心地区,两遗址的两周时期遗存序列完整,陶器组合齐全,其西周至春秋早期遗存与春秋中期以后的典型楚文化陶器遗存有直接的逻辑演变关系,故通常被学术界视为早期楚文化的代表性遗存。钟祥六合遗址出有少量西周时期遗存,陶系以红陶为主,器物组合有鬲、甗、豆、罐、钵、缸等,陶鬲与真武山西周中期陶鬲较为接近^[21]。汉水东北地区则有年代较早的遗存,枣阳毛狗洞H1,出土遗物与黄陂鲁台山较为近似,器类以鬲、缸为主,陶系以红陶为主,红陶比重略小于鲁台山,鬲的基本特征是侈口、尖唇、束颈、联裆、裆上内瘪、裆高中等,器形较粗大,截锥足或柱足,年代为西周早期^[22]。襄樊小马家遗址,年代为西周早中期,其西周早期遗物与关中近似度较高,如鬲为近空袋状分裆柱足,盆为宽沿深腹,均与关中同类器相近,西周中期遗存则明显具有楚文化特征,出现了二次包制鬲足,以柱足鬲为主,盂一般为外翻沿、圆凸肩,与沔西地区斜折沿、折肩的风格有较大差异,此外陶系中红陶比重较大,鬲、甗、罐等器物较为粗大,这些特征与枣阳毛狗洞H1十分接近^[23]。枣阳周台遗址出有较丰富的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遗存,其文化面貌与郭家岗、真武山遗址相近而又有自身的特点,主要是陶系中灰陶比例较大,红陶较少,器物组合虽然大体相同,但某些器类更接近于关中,如周台遗址的陶盆与真武山差距较大,其斜折沿、折肩的风格更接近于关中周文化^[24]。另河南内乡黄龙庙岗遗址商代晚期遗存中发现有一种二次包制的矮柱足鬲,为该遗址的特征性器物,这类鬲折沿、腹微鼓、深袋足,分裆,裆较浅,截锥足较矮,与枣阳毛狗洞、新洲阳逻香炉山等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的柱足鬲很相似^[25]。

在西陵峡地区,庙坪遗址发现了几件较完

整的西周陶鬲^[26]。除纹饰为方格纹外,其余特征与真武山、郭家岗等地所出陶鬲基本一致,具有早期楚式鬲的特点,其年代,原报告定为西周中期,此年代明显偏早,应为西周晚期。此外,西陵峡区的宜昌上磨垸^[27]、秭归柳林溪^[28]等遗址,均出土有与早期楚文化有关的周代遗存,这批遗物的年代,大抵为两周之际前后。

在长江北岸,湖北地区的江陵荆南寺遗址出土了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年代约为西周晚期,文化性质属典型的早期楚文化^[29]。另盘龙城出土的平裆鬲与罐形鼎亦见于荆南寺夏商遗存(报告中均称为A型鬲),但只见于较早的地层中,年代约为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30]。江陵梅槐桥遗址未见有西周时期地层,但在扰乱层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陶鬲,鬲体较瘦长,折沿近平、高直颈,肩微弧,瘪高裆,柱足较高,经刮削略呈疙瘩状^[31]。与真武山所出西周陶鬲较为近似,年代应为西周晚期。潜江龙湾遗址亦出有西周晚期遗存,陶系以红褐陶和红陶为主,多饰绳纹,陶器有楚式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32]。湖南地区亦发现了一些与早期楚文化有关的西周遗存,澧县文家山遗址乙区灰坑出有一鬲一豆,鬲的形态为弧形连裆浅空足,足尖乳突状,拍绳纹,外侧再包制较高的截锥足,束颈卷沿圆唇,这是较典型的楚式鬲形态,稍晚的澧县周家湾、周家坟山遗址则出土了楚式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33]。岳阳阎家山、骆坪遗址也出土了西周时期的楚式鬲、盂、豆、罐组合^[34]。

综上所述可见,早期楚文化的分布地域,夏商时期仅限于鄂东盘龙城一带,到西周时期,东至鄂东和鄂东北,北至丹江流域,西至西陵峡,南至长江沿岸,基本上涵盖了整个江汉地区。

二、早期楚文化的时空进程

粗略分析,江汉地区早期楚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夏代及商前期,即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的代表性遗存有盘龙

城外的王家寨、李家嘴等遗址及荆南寺遗址部分夏商遗存。这一时期是早期楚文化的萌芽阶段,也是北方的鬲文化与南方的鼎文化开始融合的时期。陶器遗存以鼎式鬲为代表,已初步具有楚式鬲的基本特征,如陶系以红陶和红褐陶为主,空足极浅,似有略无,锥足较高、足为二次包制等,鄂东地区夏商时期出现的鼎式鬲,虽然还不能称之为楚式鬲,但我们可以确定,这是楚式鬲在江汉地区最早的起源,是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融合中原文化因素与自身原有文化传统的结果。此外,在盘龙城遗址中,鼎式鬲与鬲式鼎基本上是同时出现,但总的发展方向是向鬲演变,盘龙城的罐形鼎主要盛行于盘龙城一至三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而平裆鬲的发展则贯穿了整个盘龙城文化,盘龙城二期时又从平裆鬲发展出联裆鬲,延至盘龙城七期。萌芽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器物组合有平裆鬲、联裆鬲、罐形鼎、甗、尊、大口缸、盆等器物,陶系以红褐陶和红胎黑陶为主,陶器部分来源于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如红陶大口缸,部分来源于中原商周文化,但与中原同类陶器在陶质、陶色和器形上有一些差异,显然是经过了当地土著民族的改造。高崇文认为,这批红陶器是在中原商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文化因素,本身就体现了两种文化因素^[35]。这一时期或可称为鼎式鬲时期。

第二期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代表性遗存有蕲春毛家嘴西周遗存、黄陂鲁台山H1、枣阳毛狗洞H1及、式陶鬲、武汉阳逻香炉山北区第11层、河南内乡黄龙庙岗晚商遗存等。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柱足鬲成为主流。上期的高锥足平裆鬲(鼎式鬲)和联裆鬲本期均发展成为柱足、上期的商式分裆鬲本期亦发展成为柱足分裆鬲,陶鬲的柱足作风成为早期楚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从毛家嘴遗址来看,商末周初时,平裆柱足鬲、联裆柱足鬲及分裆柱足鬲并存,但到西周早期时,可能是由于强势周文化的影响,平裆鬲消失,分裆鬲也极罕见,截锥足联裆鬲成为主流,并在周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瘿裆作风。陶系仍以夹砂红陶、红褐陶或

夹砂红胎黑陶为主,器型普遍较大。陶器组合为鬲、甗、罐、盆、缸等,尚未出现早期楚文化典型的陶器组合。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高锥足鼎式鬲发展成为柱足鬲(实为截锥足),虽然就目前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尚未出现早期楚文化的典型陶器组合,但柱足鬲的出现,标志着早期楚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因此这一时期是早期楚文化的发展期,以柱足鬲为代表,或可称为柱足鬲时期。

第三期为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主要的代表性遗存有襄樊真武山H36、H39、H85、H79、H81、G3,宜城郭家岗H109、H187,肖家岭H22,荆州荆南寺西周遗存等。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一是柱足鬲发展成为楚式鬲,上一期较短的截锥足发展成较高的圆柱足,虽仍保留周式的瘿裆作风,但已具备楚式鬲的基本特征,与春秋中期以后楚式大口绳纹陶鬲有直接的演变关系,可以认为,这种带瘿裆的红陶绳纹高柱足鬲就是楚式鬲的早期形态,是早期的楚式鬲。二是出现了较完整的鬲、盆(或盂)、豆、罐陶器组合,且此组合与春秋中期以后的典型楚文化陶器组合一致。从以上两方面看来,只有到了这一时期,才真正出现了具有成熟器形和完整陶器组合的早期楚文化遗存。因此,这一时期可视为早期楚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楚式鬲,又可称为楚式鬲时期(早期楚文化中陶鬲的演变,参见附图)。

由上简单分析可知,早期楚文化在江汉地区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发展历程,其最初的创造者是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这些江汉土著民族在强势中原文化的统治下,将来自中原的商周文化与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鬲文化,这一支鬲文化到后来即演变为早期楚文化。夏代至早商,是早期楚文化的萌芽阶段,鬲与鼎开始融合,出现了鼎式鬲或鬲式鼎;晚商至西周早期,是早期楚文化的发展阶段,商末周初时,平裆柱足鬲、联裆柱足鬲和分裆柱足鬲并存,这些器物基本是上期陶鬲的发展形态,至西周早期,带瘿裆作风的截锥足联裆鬲成为主流,柱

三、江汉地区考古学文化演进与早期楚文化的产生

足成为江汉陶鬲最主要的共性特征,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则是早期楚文化形成时期,出现带瘡裆作风的高柱足红陶绳纹鬲,也就是早期楚式鬲,并出现了鬲、孟(盆)、豆、罐的完整陶器组合。

在空间结构上,夏商时期,江汉地区的鼎式鬲遗存出现在以鄂东为中心的地区,就目前材料而论,此类遗存在鄂东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长江两岸均有此类鼎式鬲遗存,向西则分布到了江陵荆南寺遗址。此时的南北文化融合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

晚商至西周早期,商文化退出江汉地区,周文化开始影响江汉土著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水东北一线,由南阳盆地至长江北岸,出现柱足鬲遗存。此时早期楚文化遗存的分布局限于汉水东北,尚未越过汉水和大洪山,进入江汉核心区,而汉水西南的考古学文化与汉水东北的早期楚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和面貌^[36]。

西周中期以后,早期楚式鬲和早期楚文化陶器组合形成。在空间分布上,这一时期早期楚文化遗存大举南下,进入夏商时期尚较为荒凉的江汉平原核心地区,并直达长江沿岸。此时早期楚文化遗存已遍及江汉地区,但重心则明显在鄂西地区,其发展态势是从北向南,北部襄宜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年代较早,最早可早至西周中期,南部荆沙地区则较晚,不超过西周晚期。而原来早期楚文化最早渊源的鄂东及鄂东北地区,虽然仍可在广义上归入早期楚文化,但其文化面貌与自身的发展进程明显与鄂西地区较为典型的早期楚文化有了一些差异,在文化面貌上有更强一些的周文化特征,如陶系中灰陶比重远大于鄂西地区、某些器型如孟、盆等类器物更接近于关中。我们推测,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当是由于汉东地区成为西周嫡系的汉阳诸姬封地,而鄂西地区则为楚蛮及其他江汉土著所居^[37],故西周中晚期时,汉东地区在文化发展上与鄂西地区拉开了一些距离。

江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曾有过发达的人类社会。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都是已发展到很高水平的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时期,江汉文化体系曾向北扩张,占据了原属于中原文化区域的汉水中游北部及丹江地区,其文化影响则直到豫中地区。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形势逆转,中原文化日益强盛,对石家河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由于中原文化因素的大量进入,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发生了质变,其陶器群体已失去石家河文化的共性特征,长江中游地区的本地特征越来越少,除少量因素外,主体部分与石家河文化并无关系,因此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应是不同于石家河文化的另一支考古学文化。此类遗存,目前考古学界一般称为后石家河文化或三房湾文化^[38]。

后石家河文化只有部分因素源自石家河文化,大部分因素来自同期的中原文化,尤其是煤山文化,因其与煤山文化的密切关系,被考古学者视作“煤山文化江汉地区的一种变体”,其成因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南下^[39]。“来自中原的后石家河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结构^[40]。后石家河文化是中原文化南下江汉地区后,融合本地部分因素、在当地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目前一般认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三苗创造的文化遗存,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华夏集团与南方的苗蛮集团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尧曾与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41]”,到了禹时,战争更加激烈,最后禹利用三苗出现内乱、遭逢天灾之机大举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三苗从此衰微,不再见于文献。

后石家河文化是三苗衰微后南下的中原文化与江汉地区的原石家河文化融合的产物。结合文献记载似可推测,这当是禹征服三苗后

迫使三苗居民改宗中原文化。但后石家河文化在夏商时期并未得到持续的发展,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后石家河文化之后出现了中断,原来已发展到很高程度的人类社会在江汉地区消失了。夏商时期的江汉地区相当荒凉,夏商遗存在江汉腹地几乎不见,仅有零星的分布,而在原来江汉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则保持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但文化性质发生了变化,不是原有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发展,而是中原夏商文化的地方变体。

江汉地区的早期楚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类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创造者显然不是来自中原的夏商移民,而是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这些江汉土著民族应即古三苗的遗裔,他们在改宗中原文化之后,开始尝试把来自北方的鬲文化与江汉地区原有的鼎文化融铸为一炉,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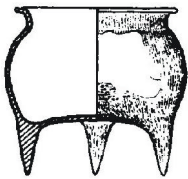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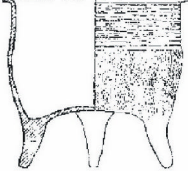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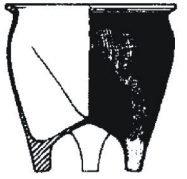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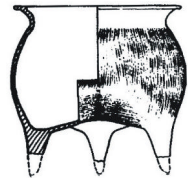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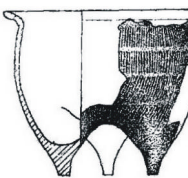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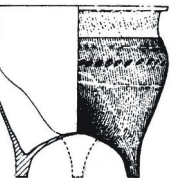
三苗灭亡之后,继三苗而起的南方民族主要是楚蛮(或荆蛮),按苗与蛮本为一义,学者普遍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楚蛮民族即古三苗的遗裔。由是可知,早期楚文化最初是由楚蛮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融合自身原有文化传统创造的。

四、楚国与早期楚文化

由上分析可知,早期楚文化的起源与半姓

楚国、楚族、楚人无关。半姓一族属祝融八姓之一,祝融八姓的分布,学者做过较多研究,从氏族社会后期到夏代末年,祝融各族所居,东至今山东西部、江苏西北,南未过淮河、方城,西未及关中,而北至山西西南和河南北部,基本未出黄河中游地区⁴²¹。此时的半姓部族与江汉地区完全无关。进入商代,祝融族系各支在夏商鼎革中受沉重打击,半姓部族的发展亦遭重大挫折,不仅居地不明,连世系也不清楚;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⁴³¹。至商末周文王时,始有季连之后裔曰鬻熊出现在历史上,在商代绝大部分时期,半姓一族即使已进入江汉地区,也是一微不足道的小部族。可见夏商时期萌芽于鄂东的早期楚文化与半姓祝融毫无关系,此时的早期楚文化是江汉土著民族的文化,文献记载中的楚蛮,可能就是这些江汉土著民族的主体。

从以前的资料来看,西周时期,半姓楚国建国于楚蛮之地,才与早期楚文化有了联系。但最新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有一篇《楚居》,据《楚居》所载,半姓祝融自穴熊(鬻熊)晚期或熊丽时期起始有楚人之称⁴⁴¹,此时约在商代末年或商周之际,可见半姓与楚地及楚地居民产生交集,与早期楚文化发生联系,在文化上具备早期楚文化属性当在商末或商周之际。入周之后,楚国又被封于楚蛮之地,

鼎式鬲	柱足鬲	早期楚式鬲
		
盘龙城 PWZT20 :1	毛家嘴 12/2:3:10	真武山 H36:4
		
盘龙城 PWZT85 :4	鲁台山 H1 :1	郭家岗 H187:1

楚始封之地,虽众说纷纭,可以肯定是在江汉地区,也就是说必在早期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但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国、族,其中有汉阳诸姬及申、吕等周之同姓和姻亲诸侯,有邓、谷等周之异姓诸侯,亦有卢戎、罗、贰、轸等江汉小国,亦有楚蛮、百濮等江汉土著民族,半姓楚国仅是其中很小的一支。西周时期的早期楚文化,是南下的西周诸侯带来的周文化与江汉土著原来的文化融合后形成的,是西周诸侯与江汉土著民族共同创造的。直到春秋早期以后,随着楚国的迅速强大,楚国才成为早期楚文化中的主导力量,并且将早期楚文化发展成为春秋中期以后的典型楚文化。

注释:

本文得到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科研课题“楚都丹阳探索”(合同编号 NK11)资助,特此说明。

[1] 苏秉琦《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2] 俞伟超《先秦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

[3]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1~153页。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遗址东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7] 湖北黄冈市博物馆、湖北蕲春县博物馆《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垭西周铜器窖藏》,《文物》1997年第12期。

[8] 李学勤《谈孟方鼎及其他》,《文物》1997年第12期。

[9] 程平山《蕲春毛家嘴和新屋垭西周遗存性质略析》,《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

[10] 黄陂县博物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11] 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吕王城重点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熊卜发《大悟吕王城遗址》,载熊卜发编著《鄂东北地区文物考古》,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熊卜发《鄂东北地区两周时期陶器分期与文化特征初探》,载熊卜发、李端阳、涂高潮编《鄂东北考古报告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12] 香炉山考古队《湖北武汉市阳逻香炉山遗址考古发掘纪要》,《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放鹰台》,科学出版社,2003年。

[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冈地区博物馆、罗田县文物管理所《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1期。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川乌龟山西周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97年第1期。

[16] 杨亚长、王昌富、曹玮《近年来陕西境内新发现的楚文化遗存》,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年。张天恩《丹江上游西周遗存与早期楚文化关系试析》,载所著《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1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1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年。

[20]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21] 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22]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枣阳毛狗洞遗址的调查》,《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

[23]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区文物管理处《襄阳黄集小马家遗址发掘简报》,载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24]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文物考古队《枣阳周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25] 杨宝成《论西周时期汉东地区的柱足鬲》,《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杨宝成:《内乡县黄龙岗商代遗址及战国秦汉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26]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3年。

[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宜昌县上磨垭周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8期。

[28]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

[29]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30]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文物出版社,2009年。

[31] 湖北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梅槐桥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

[32] 湖北省潜江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潜江龙湾》,文物出版社,2005。

[3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商周时期古遗址调查与探掘》,载《湖南考古辑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7年。

[34]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岳阳市效毛家堰--阎家

山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期。

[35] 高崇文《从夏商时期江汉两大文化因素的源流谈楚文化起源》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36] 参杨权喜《湖北商文化与商朝的南土》,载《奋发荆楚 探索文明》,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杨宝成:《论西周时期汉东地区的柱足鬲》,《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7] 刘玉堂、尹弘兵《楚蛮与早期楚文化》,《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8]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王劲《关于后石家河文化定名

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39] 白云《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

[40]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

[41] 《吕氏春秋》卷20《召类》。

[42] 徐少华《论祝融八姓的流变及其分布》,载《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江汉考古编辑部,1998年。

[43] 《史记》卷40《楚世家》。

[4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arly Chu's Culture

Yin Hongbing

(Wuhan, Hubei 430077)

Abstract: Panlongcheng, dated to the Xia and Shang period and mainly distributed to eastern Hubei province, is the earliest manifestation of Chu culture in Jiangnan area,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ding-cauldron style li-tripod. Cultural manifestation with vessels of Column-foot li-tripod appeared in northeastern Han River area, dated to late Shang to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Chu manifestations during the middle-to-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is represented by a combination of early Chu style li-tripod and other early Chu pottery vessels. Meanwhile, sites of early Chu culture are distributed all over the Jiangnan area, but the center remained to be located in western Hubei province. Early Chu culture in Xia and Shang period has little to do with cultural manifestation of Chu State, while the Chu Stat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was only a small part of early Chu culture.

Keywords: early Chu's culture, Jiangnan area, Chu State

(责任编辑、校对:蔡丹)